

免责声明：凡在本杂志发表的文章只代表作者观点，而非美国国防部、空军部、空军教育和训练司令部、空军大学或美国其他任何政府机构的官方立场。

四十五年无奈依旧

——美国空中力量对付反叛力量的长久困境

Forty-Five Years of Frustration

—America's Enduring Dilemma of Fighting Insurgents with Airpower

马克·克洛德菲特博士 (Dr. Mark Clodfelter)

战略家喜用对比，一个常用的比较对象就是越南战争。专家学者、政策制定者、记者、历史学家等，在评说自从西贡陷落以来美军所卷入的每一场冲突时，几乎无一不想起越战的幽灵，提及越战的泥沼。当前的伊拉克战争和阿富汗战争也不例外。随着美国越来越深地卷入伊拉克战事，美国《国家杂志》2003年11月22日的封面标题是：“伊拉克犹如越南”。一年以后，美国《新闻周刊》的封面标题是：“伊拉克危机：越战因素”。再一年，美国《外交事务》的封面赫然列出前国防部长梅尔文·莱尔德 (Melvin Laird) 撰写的该期重要文章：“伊拉克：汲取越战教训”¹ 继续往下，《新闻周刊》2009年2月9日的封面标题是：“奥巴马的越南：怎样拯救阿富汗”。² 鲍勃·伍德沃德 (Bob Woodward) 的新著《奥巴马的战争》(Obama's Wars) 进一步揭示越战“鬼魂”如何影响了奥巴马总统向阿富汗增兵的决定，书中并引用了拜登副总统在2009年11月向总统提出的警告，要求总统在阿富汗战争问题上给出明确的方向；拜登坚持说：若无坚定的指引，“我们会陷入另一场越战”。³

诸如此类的宣示也许耸人听闻，但越战和当前的冲突之间确有可比之处。要说越战为当前的军事行动树立了精确的评价标杆未免言过其实，毕竟每一场战争都有其特征，杂陈的变量混合为每一场战争编织出独特的背景，一场战争的制胜策略对另一场战争而言可能是全军覆没的药方。在许多方面，越

南战争和伊拉克战争或阿富汗战争相比，异远大于同。但对战略家而言，在评估伊阿战场上的美军行动时，如果对越战教训视而不见，则铸成错误。不错，美军在越南面对的敌人从许多方面来看不同于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敌人，但是眼前的对手所发动的攻击映照出越共部队和其北越支持者的零散游击战法，这种游击战在约翰逊总统执政的大部分时间一再发生。一如现任总统奥巴马在伊拉克和阿富汗追求的政治目标，当时的约翰逊总统也是意图建立一个稳定的、独立的、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政权，但是要把这个目标转化为可行的军事目标，则证明极端困难。并且，奥巴马总统和约翰逊总统的处境很像，在选择适当的军事力量工具实现其政治目标时，必须考虑其行动对全球的影响。

约翰逊总统认定，空中力量是一项关键的军事工具，能够抑制敌军的能力和意志，使其无力推翻美国扶植的西贡南越政权。奥巴马总统也诉诸空中力量来扶持巴格达和喀布尔新生不久的政府。就美国的政治目标和敌人的作战方式而言，越战和伊阿战争之间有许多相似性，越战的示例为当前的空中力量运用提供了一个耐人寻味的对照。概言之，这一幕幕事件说明，面对那些擅长躲避常规作战并博取世界公众舆论有力支持的顽强敌人，要想借助炸弹来达成广泛的政治目标注定会遭遇困难。尽管越战的经验不可能为伊拉克或阿富汗战争面临的问题带来准确的答案，但是恰如利德尔·哈特 (B. H. Liddell

Hart) 在谈及历史的价值时所说, 它确实提供了“从先人的错误中汲取教训的机会”。⁴

文化比较

越战和当前战争的一个重大区别是, 敌人的组成状况不同。在越战中, 当地交战各方在宗教信仰和种族上差异极小, 政治和意识形态目标主宰着争夺越南南方控制权的战争。⁵ 南越的反叛组织, 即民族解放阵线, 简称“越共”, 以推翻美国扶持的西贡政府为目标, 并从其北越后台获得人力和物资支援。胡志明把北越正规军源源不断地潜运到南越, 到 1967 年 8 月, 越共部队估计总数达到 300,000 人, 其中有 45,000 名北越军人。⁶ 南越政府建立了一支庞大的地面部队, 兵员最终接近一百万人, 其中许多人受过美式训练。⁷ 但是这支部队在战斗中的表现差强人意, 约翰逊总统不得不增派美军。1963 年, 美国有 16,000 名军事顾问在南越, 到 1969 年他离开白宫时, 在南越的美国作战部队已超过 500,000 人。他还从美国在亚洲的盟邦获得了有限的援助, 包括南韩派遣了 50,000 名军人到南越。⁸ 但是对于许多南越人——包括许多支持西贡政权的南越人——而言, 美国人及其盟友显然“非我族类”, 而是占领军。⁹

越南人的种族和宗教类同性与伊拉克和阿富汗当地交战各方的差异性形成明显的对比。在伊拉克, 什叶派和逊尼派的对立产生了大量的宗派暴力, 迟至 2010 年, 双方的战斗仍然导致每月有数百名平民死亡。¹⁰ 许多宗教领袖, 例如萨德尔, 组织了民兵武装, 有时和政府军对抗, 有时则和敌对派别冲突。种族差异也比比皆是。伊拉克北方库尔德族是长期坚持独立诉求的少数民族, 但是库尔德族人——以及什叶派——在伊拉克当前安

全部队中占很大比重。截至 2010 年 9 月, 安全部队的兵员超过 660,000 人, 他们尽管受过美式强化训练, 其作战能力仍难令人放心。¹¹ 除了民兵之外, 当地的犯罪分子在伊拉克也占有地盘, 极端组织和阿拉伯复兴党人经常发起攻击, 人肉炸弹也在继续从叙利亚零散地潜入伊拉克。¹² 在技术层面, 美国已经结束其在伊拉克的作战行动, 但仍有将近 50,000 名士兵留守该国, 在 2010 年到 11 月为止, 仍有 20 名美国人死于敌对火力。¹³

在阿富汗, 各个部落的纵横捭阖则又是一番景象, 这些部落往往相互残杀, 想推动他们形成反对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统一战线, 谈何容易。宗派分歧也是到处可见: 普什图族是最大的族群, 主要是逊尼派穆斯林, 还有少数什叶派, 但是该族群又分为两大部落, 即吉尔查伊部落和杜兰尼部落; 塔吉克人也是一个大族群, 里面有逊尼派和什叶派; 法尔西万人是什叶派; 哈扎拉人是逊尼派和什叶派兼而有之; 乌兹别克人和土库曼人则是逊尼派。¹⁴ 其他还有许多部落, 分别效忠错综交织的宗派, 而且许多部落的控制地域跨越国界, 延伸到巴基斯坦、土库曼斯坦和乌兹别克斯坦。截至 2010 年 9 月, 阿富汗国民军的兵员总数为 138,200 人, 来自不同的部落, 都受过北约军事顾问的训练。¹⁵ 北约自己有一支 140,000 人的国际安全援助部队 (ISAF), 目前包括将近 100,000 名美国军人。这支部队努力扶持普什图族杜兰尼人卡尔扎伊领导的阿富汗政府 (尽管卡尔扎伊经常指责北约和美国的行动), 但外国军队在这个国家的存在更加凸显了阿富汗错综复杂的族群版图。¹⁶

政策比较

在越战期间，约翰逊总统也曾尽力扶持羽毛未丰的当地政府。他把美国在东南亚的战争目标定义为维持一个稳定的、安全的、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政权——一个无法具体量化进展的目标；他还把越南战争视为遏制全球共产主义侵略的广泛行动中的一个关键部分。¹⁷ 因此，他把胡志明视为苏联和中国的走卒，在为保护非共产主义的南越政权而策划各种行动时，总是以莫斯科或北京会如何反应为前提。约翰逊还顾虑世界公众舆论对美国行为的反应，担心公众会把美国视为圣经中的巨人歌利亚，把北越视为被欺辱的大卫，歌利亚欺凌大卫的情景不仅会削弱美国扶持南越的努力，还会削弱为挫败共产主义向世界其他地区扩张所需的支持。还有，约翰逊总统试图减少美国公众对越战的注意力，希望公众更多地关注他在美国国内推行“伟大社会改革计划”所投入的资金，而不要注意花在 8,000 英里以外的一场战争中的费用。

美国在伊拉克的目标与美国当初在越南追求并扩大的目标如出一辙。布什总统起初是寻求一个具体的目标：把萨达姆·侯赛因赶下台，防止他获得大规模杀伤武器。实现这个具体目标之后，布什总统又扩大了目标范围，试图在伊拉克建立民主制度和安全、稳定的局面。¹⁸ 越战期间的约翰逊总统总是看到冷战超级大国苏联和中国浮现在幕后的影子，布什总统也一样，决定在伊拉克采取何种行动时，不得不考虑全球反恐战争的大局。武力的大量使用反而促使敌人加紧招兵买马，吸引伊拉克境外的基地分子等狂热的原教旨主义者，或者伊拉克国内的某些派别，这些派别认为过多的武力是直接针对其所属的族裔或宗教群体。奥巴马总统也在继续试

图维持伊拉克的安全和稳定。¹⁹ 尽管暴力水平低于其前任所面临的状况，美国人和伊拉克人继续死于各种暴力活动，伊拉克仍然不安全。

在阿富汗，奥巴马总统也面临类似的挑战。战争初期的重点在于推翻塔利班政权，而此后，安全和稳定一直是主宰美国行动的首要目标。但是美国总统在追求在阿富汗的目标时，必须顾及和融合北约及多国部队的目标，遗憾的是这些目标有时并不容易互相融合。此外，阿富汗各部落对基地组织和塔利班叛军的支持程度不尽相同，有些敌方成员居住在国界另一边的巴基斯坦，巴基斯坦作为一个拥核国家，又有自己的安全和稳定问题，并且有时还协助阿富汗塔利班。²⁰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当初引导美国行动的崇高民主目标缓慢地演变成“调停”，但是，鉴于这两个国家深受族群和宗派分歧之害，要想实现调停目标也极为困难。²¹

奥巴马总统于 2009 年 12 月在西点军校所做的演讲中更为具体地指出：美国在阿富汗的目标是铲除基地组织的安全庇护所、逆转塔利班的发展势头和阻止其推翻政府，并且加强阿富汗的安全部队和政府力量，使他们能够“为阿富汗的未来承担主导责任”。²² 为了实现这些目标，他授权增加部署 30,000 名美军，并宣布美国将在 2011 年 7 月开始从阿富汗撤军。届时，阿富汗军队将开始在安全防卫方面发挥更大的作用。这个做法类似于当年的“越南化”计划，该计划是美国在越战最后几年的战略基石。

重走老路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不仅是伴随战争而来的美国广泛政治目标似曾相识，冲突的类

型也和约翰逊总统任期内大部分时间里美国在东南亚面临的战争有诡异的相似之处。发生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的冲突，都以常规战争开始，然后快速演变为零散游击战。越南的情况则是，当美军作战部队在1965年介入时，南越形势以越共叛乱为主，这种情况一直延续到越共于1968年发动春节攻势，并从此大伤元气。但是，像约翰逊总统一样，奥巴马总统耗费大量精力试图打败擅长游击战术的叛乱分子；布什总统也是如此。另外，布什和奥巴马也像约翰逊一样：依赖空中力量——尤其是轰炸力量——作为打击叛乱敌手的重锤。当我们把美国不断扩大的政治目标和敌人的作战方式结合起来考虑时，我们看到：空中力量很难取得积极效果。

约翰逊总统将轰炸作为抑制越共叛乱的首选军事对策。他认为越共一旦失去北越后盾将无法继续作战，于是千方百计地想切断从北越进入南越的军事物资和人员供应线。空中力量似乎非常适合这项任务，总统可以小心地控制轰炸强度，从而避免中国人或苏联人或世界公众的谴责，还可防止分散美国公众对“伟大社会改革计划”的注意力。再者，在美军伤亡方面，使用空中力量比使用地面部队“代价低”，而且可激励西贡政府及其武装部队的士气。最后，轰炸的逐步升级将让胡志明意识到他的国家面临来自空中的最终毁灭，将迫使他放弃越共叛乱，以免亡国。这些基本假设引导约翰逊在1965年3月开始对北越实施“滚雷”空中战役。²³

不幸的是，事实证明这些假设并不正确。越共（及其北越后盾）平均每月只作战一天，因此每天只需要从南越境外获得三十四吨军事物资，这点物资只需要七辆两吨半载重量的卡车就可以运输。²⁴只要敌人选择这种零散作战方式，没有任何轰炸能够阻止他们获

得所需的少量军需品。西贡政府的士气确实受到“滚雷”的激励而上升，不过很快又回落，而胡志明则在逐渐增加派遣到南方的北越军人。他高兴地看出约翰逊的轰炸行动受到各种条件的制约，他知道根本不需要害怕轰炸。约翰逊总统后来增派美国地面部队去对抗越共和北越军队，“滚雷”逐渐升级，又持续了三年——此时的算盘是它会约束敌人可能在南方发动的战役的规模。但是，1968年春节攻势的规模之大出人意料，砸碎了这个神话。

“滚雷”行动持续了三年半，但投掷的炸弹比起美国在东南亚八年作战的总投弹量也只是一小部分。美国在东南亚战事中总共投掷了八百万吨炸弹，其中一百万吨扔到北越，三百万吨丢到老挝和柬埔寨，其余四百万吨炸在其盟邦南越的土地上。²⁵对北越的轰炸受到高度约束，在“滚雷”行动期间估计炸死52,000名平民，而相比之下，对南越目标的攻击则约束甚松。²⁶比如为了加强安全防护，美军指挥官们建立了“自由开火区”，即由美军或南越军队驱逐某个敌对区域的所有居民，然后将任何贸然进入者视为敌方作战人员。一旦有人出现在这些区域，美军往往就会出动飞机进行攻击，但进入这些区域者有可能是越共，也有可能只是想回老家看一看的无辜村民。越共和北越军队充分利用了美国人只要有飞机就用的习性。敌人爱用的一个战术是，在一个小村子里部署一两名狙击手，然后希望美国人来空袭，把整个村子炸平。²⁷在争夺“民心”的战争中，火力的滥伤常常让叛乱者大喜过望；那四百万吨炸弹，有许多就是不分青红皂白地投掷在南越的。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滥伤性武器不再是主要轰炸火力。“智能”弹药自1972年在北越上空首次使用以来已有显著改进，现在的

飞行员，无论是在高空还是在地球另一侧的地面控制站里，能够从很远的距离投掷炸弹并利用卫星将炸弹导引到离目标几英尺之内的地点，不受气候条件的影响。在2003年“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头一个月里，美国空军向伊拉克投掷了18,000枚炸弹，其中11,000枚是制导弹药，而在1991年“沙漠风暴”行动的43天里，联军空中部队投掷的227,000枚炸弹和导弹中，只有15%是制导弹药。²⁸ 阿富汗的情况也是如此，在2001年“持久自由”行动的头五个星期里，投掷的大约6,000枚炸弹和导弹中有2,300枚是卫星制导的2,000磅联合直接攻击弹药。²⁹

遗憾的是，尽管美军注重使用智能炸弹，仍然无法消除平民伤亡事件。2001年10月，坎大哈附近五个村庄报告美军空袭导致总共100多名平民伤亡；当地军队指挥官和阿富汗官员亦证实确有此事。³⁰ 2003年春季，在“伊拉克自由”行动的头六个星期里，估计有1,500至2,000名伊拉克平民死于轰炸。³¹ 发生这些死亡事件时，阿富汗和伊拉克正处于常规战争时期，美军致力于实现“有限”目标，即摧毁塔利班政权和铲除基地组织的庇护所，以及推翻萨达姆政权并消除据信的大规模杀伤武器威胁。这两场战争都以重拳出击，很快实现了具体的战争目标，同时却忽视了平民伤亡造成的影响。

敌人变换战术

在阿富汗和伊拉克，正规作战结束之后，零散冲突始终不断，不仅凸显了平民伤亡的后果，而且揭示了作战动机的根本变化，其之转变与越战极为相似。越共及其北越支持者拥有主动权，决定着作战时机和地点，以及作战方式。1967年和1968年是美军在越南的作战活动高峰期，但是美军巡逻队遭遇

敌人的几率只有1%；如果加上南越军队的巡逻次数，遭遇敌人的几率下降到0.1%。³² 然而，1967年和1968年也是美军伤亡最惨重的年份，阵亡人数分别为10,000名和15,000名，其中23.7%死于地雷和饵雷。³³ 在正面交战之后经常出现的暂息期间，隐蔽弹药导致的美军死亡人数可能占总数的40%或以上。³⁴ 美军空中打击和炮火成了越军饵雷炸药的稳定来源，因为B-52投掷的炸弹有5%未爆，火炮发射的炮弹则有2%未爆，加在一起等于每月送给敌人800多吨弹药。³⁵

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叛乱分子也经常能够主动选择作战规模和战术。在这两个战场，美军死于路边炸弹的比例远远超过在越南死于隐蔽弹药的比例。截至2010年11月10日，美军在伊拉克作战阵亡3,483人，其中将近三分之二死于路边炸弹，另外还有21,583名美军官兵被路边炸弹炸伤。³⁶ 伊拉克叛乱分子依靠路边炸弹，避免正面交战，尽量减少接触美军火力，其作战方式不大需要从外部获得军需品；另一方面，萨达姆的军队在2003年瓦解，导致各种军械散落在伊拉克各地。这种战术在阿富汗也屡见不鲜，塔利班和基地组织的武装分子越来越多地使用隐蔽弹药来对付美军和北约部队。截至2010年11月中旬，美军在阿富汗作战阵亡1,058人，其中死于路边炸弹583人。³⁷ 从2009年10月到2010年10月，在阿富汗发生的有效路边炸弹攻击比例增加了30%。³⁸

用空中力量挫败敌人的零散作战，其效果褒贬互见。美国于2007年实施“兵力骤增”计划，增派30,000名军人到伊拉克，同时加强空袭，该年的空袭次数为2006年的五倍。³⁹ 空军领导人声称，通过增加兵力将叛乱分子撵出了市区，拢到空袭较易打击的地方，而且情报能力改善，能够更清楚地了解

战场全貌。但是，自 2007 年 4 月开始轰炸，到该年年底仍有 200 多名平民被炸死。“阿帕奇”直升机和“捕食者”无人机发起的“地狱火”导弹攻击次数也显著增加，在 2008 年春季的两个月期间，美军对巴格达进行了 200 多次“地狱火”导弹攻击。⁴⁰ 其中许多是针对混杂在市区的敌人，尽管为避免平民伤亡做出了努力，但伤亡事件仍有发生。一名航空支队指挥官申辩说：“这不是好莱坞，不可能达到 110% 的完美。士兵和指挥官尽了最大努力，做到尽量精准。但那些坏蛋不是在开阔空间和我们打，他们躲在居民区，里面有平民，包括安分守己的伊拉克人。”⁴¹

在阿富汗，美国和北约飞机在 2007 年发动了 3,572 次空袭，是 2006 年的两倍多，更是 2005 年的 20 倍以上。这些轰炸在 2007 年估计导致 300 名平民伤亡，是 2006 年报告数字的三倍。⁴² 2009 年 5 月，一架 B-1 轰炸机在法拉省攻击叛乱分子时可能炸死了多达 86 名平民。⁴³ 面对平民伤亡，一个月后接任驻阿富汗美军指挥权的麦克克里斯托将军发布命令，要求部队停止与隐藏在村民中的叛乱分子交战。他还限制在这种情况下使用空中力量和炮火。他在 2009 年 6 月表示：“我们如果不负责任地滥用空中力量，会种下自我毁灭的恶果，可能会打输这场战争。”⁴⁴

平民伤亡造成的后果给实现安全、稳定和民主雏形的大目标带来严重的后果。2007 年 10 月 12 日对巴格达附近一个叛军盘踞点的空袭炸死了九名儿童和六名妇女，事发之后，格里格·史密斯海军少将（Rear Adm Greg Smith）声称这是一个“绝对痛心的”事件，然后他谴责叛乱分子向附近一支美军部队射击时使用平民作为人肉盾牌：“我们的一支地面作战部队遭到来自那座楼房的火力攻

击，我们不得不摧毁那座楼房。但敌人耍了一个花招……他们混在平民中，然后向美军开火，我们的部队**别无选择**，只能用相称的火力还击。”（粗体强调系笔者后加）。⁴⁵ 十之八九，敌人的“花招”奏效了，四十五年前的越共狙击手如果知道这一招，也会毫不犹豫地使用。那次轰炸是伊拉克战争期间到那时为止美军单次军事行动导致平民死亡人数最多的事件之一，媒体对该事件做了详尽报道。

美军指挥官们试图在伊拉克和阿富汗用空中力量夺取主动权，但是实际上却可能削弱当地民众对巴格达和喀布尔新政权的支持。2008 年 1 月 10 日，两架 B-1 和四架 F-16 在伊拉克中部对疑似武装叛乱分子的藏匿地、弹药储藏室和防御工事进行空袭，总共投掷了 20 吨炸弹。美国人事先警告了当地居民离开该地区，大多数居民确实离开了，因而那次空袭没有导致平民伤亡。⁴⁶ 但是，这种建立“安全”区域的做法类似当年在越南建立自由开火区，并非总能奏效。就在那次空袭发生前十天，在同一地区，以基地组织成员为目标的美军炸弹炸死了三名妇女和两名儿童。⁴⁷ 为了减少附带毁伤，空军改为采用投掷混凝土填装炸弹去引爆路边炸弹，并且经常使用 250 磅 GBU-39 “小直径炸弹”，以便尽量减小爆炸效应。但是，关键在于确定潜在目标附近什么时候可能会有平民，而目前在伊拉克和阿富汗采用的越战时期“显示武力使平民离开目标区域”的做法不能保证一定能取得正面效果。⁴⁸

2010 年 7 月，彼得雷乌斯将军接替麦克克里斯托将军担任驻阿富汗美军指挥官，其后不久，空袭次数显著增加。从 2009 年 11 月到 2010 年 5 月，美国和北约飞机平均每月实施空袭 207 次；从 2010 年 6 月到 10

月,平均每月空袭增加到 517 次。⁴⁹ 彼得雷乌斯将军曾在“兵力骤增”期间指挥驻伊拉克美军,并曾命令空袭升级以配合兵力骤增;阿富汗空袭升级与奥巴马总统在 2009 年 12 月西点军校演讲中授权派遣的 30,000 名美军到达阿富汗发生在同一时间。空袭增加也导致平民伤亡增加,尽管北约声称“导致平民伤亡事件的发生率实际上已降低”。⁵⁰ 联军的空袭在 2010 年 10 月导致 49 名平民死亡,在上一年度的 10 月则是 38 名,增加了 30%。相比之下,叛军在 2010 年 10 月杀死或杀伤了 322 名平民,其同比增长率与联军相似。⁵¹

尽管叛军导致的平民死亡人数亦有增加,联军导致的平民死亡最有可能激起阿富汗民众的激烈反应。美国国家经济研究署曾在 2010 年 7 月调查了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伤亡所造成的影响,研究报告认为:“在一个中等大小的地区开展平叛行动如果误伤平民,一次典型的平民误伤事件会在其后六周内促成六件额外的[反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暴力事件”。⁵² 该项研究还指出:“有一种说法认为:平民伤亡影响到后来的暴力行动,因为发生平民伤亡事件之后,加入叛乱组织的人更多。这些数据与此说法一致。”⁵³ 总之,“当国际安全援助部队杀死平民时,愿意投身叛乱作战者就会增加,并导致叛乱攻击增加。”⁵⁴ 该项研究认为复仇是暴力反应的主要动机(但认为在伊拉克并未发生类似的反应),并指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导致的平民死亡比叛军导致的平民死亡更有可能引发暴力反应。⁵⁵

反阿富汗塔利班的战争也蔓延到边界另一边的巴基斯坦,那里是塔利班的庇护所,就像老挝和柬埔寨曾经是越共和北越军队在东南亚的庇护所一样。但是在巴基斯坦,美国的空袭很有节制,不可和老挝或柬埔寨相

提并论,那两个国家最终总共受到三百多万吨美国炸弹的轰炸。美国对巴基斯坦的轰炸是缓慢开始的,2004 年只有一次空袭,2005 年也是一次,2006 年有三次,2007 年有五次。在 2008 年,空袭增加到 35 次,2009 年有 53 次,2010 年截至 11 月 19 日总共是 101 次。⁵⁶ 这些空袭主要由中央情报局控制的无人机实施,但也包括空军执行的几次空袭和次数有限的直升机攻击。⁵⁷ 《长战杂志》估计,自 2006 年以来,美国在巴基斯坦的空袭炸死了 1,606 名塔利班和基地组织作战人员(包括 57 名高层首脑)和 108 名平民,其中有 662 名敌军在 2010 年丧生,而该年的平民死亡人数只有 14 名。⁵⁸ 但是巴基斯坦方面声称,从 2007 年到 2009 年,无人机空袭只炸死 14 名恐怖分子首脑,却导致 700 名平民死亡。这些据说的平民伤亡在巴基斯坦人口最多的旁遮普省和信德省激起了公愤。⁵⁹

美国尽管拥有高科技武器,随着其在阿富汗和巴基斯坦的轰炸不断升级,发生附带损伤的几率也显著增加,而每个附带损伤事件都使得稳定和安全前景更加渺茫。这些事件吸引媒体的注意,并且成为敌军招募兵员的最佳工具。归根结底,炸弹不能对意志坚定的敌人产生显著的影响,他们执意打一场断断续续的游击战。狡猾的叛军将依靠其非对称战法,不仅能挫败美国的空中力量优势,而且能将这种优势为己所用。只要美国指望通过轰炸来达到“安全”和“稳定”等无定形的政治目标——更遑论“民主”,叛乱分子就有可能通过零散游击战挫败这些努力。实际上,对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最大的威胁是恐怖分子自杀炸弹,而轰炸对于阻止此类威胁几乎无能为力,而且越来越多的证据显示,

空中力量导致的平民死亡事件接连发生，只会引致越来越多的自杀炸弹攻击。⁶⁰

从许多方面比较，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以及巴基斯坦）的敌人其实比他们的越共前辈的日子要好过些。美国为当前伊拉克和阿富汗战争设定的，是难以实现的且与其在越南战争中相似的目标；但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所面对的，是杂乱的敌对团伙而不是过去在东南亚交手的单一敌人。敌人纷杂凌乱，势必导致美国的战略更加复杂。再者，约翰逊总统及其顾问们虽然也对那些向全世界报道误炸事件的媒体影响头疼不已，但当时的媒体报道终究有些滞后，而不像现在的CNN、BBC和半岛电视台等，滚动提供连续、实时的电视播报。这类新闻，以及半岛电视台等媒体的片面报道，对于中东地区的公众舆论产生巨大的影响，而该地区的人口中有38%是文盲。⁶¹

结语

在所谓的争夺民心的战争中，认知的作用大于现实——实际上，认知就是现实。计谋多端的叛乱分子，无论是出于政治、思想、族群或宗教目的，总是处心积虑地寻求成功机会最大的方式发动作战。他们极力标榜自己为正义而战，渲染对手代表邪恶。美国所

追求的政治目标原无数，又依赖轰炸作为实现这些目标的关键手段，于是正中叛乱组织的下怀，有利其加强零散游击作战，而美国空中力量对此无可奈何。

要击败此类敌人，空中力量可以发挥作用，但轰炸不是上策。叛乱分子喜欢在民众的“大海”中“游泳”，只有把这些敌人从人民中孤立出来，硬杀伤力巨大的空中力量才有用武之地。然而这些敌人精明老练，想使鱼水分离何其困难。而空中力量的非杀伤应用，特别是空运和侦察能力，可极大地提高美军对反叛力量的作战能力，这已在越战中得到反复证明。美军空军领导人——以及政治领导人——的思维定势是动辄诉诸空中力量的硬杀伤力。当叛乱分子攻击美军时或我方情报精确锁定“高价值”目标时，我们很难想象美军空中部队指挥官会考虑放弃轰炸这个选项。但是这些指挥官及其政治领导人必须全面了解轰炸的潜在后果，把想要获得的短期收益与可能需要付出的长期代价进行比较。在某些情况下，付出代价有其必要；但在更多情况下，节制也许更为稳妥。大肆动用空中力量的硬杀伤力，已经导致我们在越南平叛战争中葬送了美国的广泛政治目标；如果美国在伊拉克和阿富汗再步越战后尘，只怕难逃同样结果。♣

注释：

1. National Journal [国家杂志] 25, nos. 47—48 (22 November 2003); Newsweek [新闻周刊] 143, no. 16 (19 April 2004); and Foreign Affairs [外交事务] 84, no. 6 (November—December 2005).
2. Newsweek [新闻周刊] 153, no. 6 (9 February 2009).
3. Bob Woodward, Obama's Wars [奥巴马的战争], (New York: Simon and Schuster, 2010), 97, 279, 324.
4. B. H. Liddell Hart, Why Don't We Learn from History? [我们为什么不汲取历史教训?], (New York: Hawthorn Books, 1971), 16.
5. 越战结束时越南的人口总数为4000万，其中估计有290万是天主教徒。其他人的信仰则较为混杂，包括佛教、万物有灵说和占星术；也有许多人信奉儒家思想。参看 Delia Pergande, "Roman Catholicism in Vietnam" [天主教在越

- 南], in *The Encyclopedia of the Vietnam War: A Political, Social, and Military History*, ed. Spencer Tucker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0), 360.
6. “Meeting with Foreign Policy Advisors on Vietnam” [与外交政策顾问讨论越南问题], 18 August 1967, Meeting Notes File, box 1, Lyndon Baines Johnson Presidential Library, Austin, Texas.
 7. Guenter Lewy, *America in Vietnam* [美国在越南],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8), 455.
 8. Terrence Maitland and Peter McInerney, *A Contagion of War* [战争的蔓延], (Boston: Bost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3), 91.
 9. 前越共司法部长 Truong Nhu Tang 和 David Chanoff 及 Doan Van Toai 合著的 *A Vietcong Memoir* [一名越共的回忆录] 通篇反映了这个观点。(New York: Vintage Books, 1985).
 10. Larry Kaplow, “Think Again: Iraq” [重新考量: 伊拉克], *Foreign Policy*, 15 November 2010, http://www.foreignpolicy.com/articles/2010/11/15/think_again_iraq.
 11. Brig Gen Jeffrey S. Buchanan and Brig Gen Kendall P. Cox, *Operation New Dawn: Official Website of United States Forces-Iraq* [新曙光行动: 启动美国驻伊拉克部队官方网站], press conference, 7 September 2010, <http://www.usf-iraq.com/news/press-briefings/brig-gen-jeffrey-s-buchanan-and-brig-gen-kendall-p-cox-sr-sept-7>.
 12. 见注释 10。
 13. 见注释 10。
 14. 许多什叶派成员部落之间也有差异。塔吉克什叶派是伊斯玛依教派, 哈拉拉什叶派则包括伊斯玛依教派和更为传统的“十二伊玛目什叶派”。
 15. NATO Media Backgrounder, “Afghan National Security Forces (ANSF)” [阿富汗国家安全部队 (ANSF)], 26 October 2010, http://www.isaf.nato.int/images/stories/File/factsheets/1667-10_ANSF_LR_en2.pdf. 截至 2010 年 9 月, 阿富汗警察总数为 120,500 人。
 16. Joshua Partlow, “Karzai Calls on U.S. to Lighten Troop Presence” [卡尔扎伊要求美国减少驻军], *Washington Post*, 14 November 2010; 另参看 “Attacks Kill 8 Foreign Troops in Afghanistan” [阿富汗叛军攻击杀死 8 名外国军人], *Reuters*, 14 October 2010, <http://www.reuters.com/article/idUSTRE69D10P20101014>; 另参看 Karen DeYoung, “Obama Pushes Back on Karzai Criticism” [奥巴马反驳卡尔扎伊的批评], *Washington Post*, 21 November 2010. 最后一篇文章列出国际安全援助部队在阿富汗的驻军总数大约为 140,000 人; 第一篇文章则列为 150,000 人。
 17. “NSAM 288, U.S. Objectives in South Vietnam, 17 March 1964” [NSAM 288, 美国在南越的目标, 1964 年 3 月 17 日], 参看 Neil Sheehan et al., *The Pentagon Papers* [五角大楼文件], (New York: Bantam Books, 1971), 283.
 18. 例如, 参看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Address to the Nation Regarding Iraq” [布什总统关于伊拉克问题对全国的演讲], 7 September 2003, <http://www.johnstonsarchive.net/terrorism/bushiraq5.html>; 另参看 “President George W. Bush’s Address to the United Nations” [布什总统在联合国的演讲], 23 September 2003, <http://www.johnstonsarchive.net/terrorism/bushiraq6.html>.
 19.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End of Combat Operations in Iraq” [总统关于结束伊拉克作战行动对全国的演讲],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31 August 2010),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2010/08/31/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end-combat-operations-iraq>.
 20. Ahmed Rashid, *Descent into Chaos: The U.S. and the Disaster in Pakistan, Afghanistan, and Central Asia* [陷入混乱: 美国以及巴基斯坦、阿富汗和中亚的灾难], (New York: Viking, 2008), 219—39, 265—92.
 21. Steven Lee Myers and Alissa J. Rubin, “U.S. Scales Back Political Goals for Iraqi Unity” [美国降低伊拉克团结的政治目标], *New York Times*, 25 November 2007.
 22. Barack Obama, “Remarks by the President in Address to the Nation on the Way Forward in Afghanistan and Pakistan” [总统关于阿富汗和巴基斯坦局势前景对全国的演讲], [United States Military Academy at West Point, West Point, New York] (Washington, DC: White House, Office of the Press Secretary, 1 December 2009), <http://www.whitehouse.gov/the-press-office/remarks-president-address-nation-way-forward-afghanistan-and-pakistan>.
 23. Mark Clodfelter, *The Limits of Air Power: The American Bombing of North Vietnam* [空中力量的局限性: 美国对北越的轰炸], (Lincoln: University of Nebraska Press, 2006), 59—60.
 24. Headquarters USAF, *Analysis of Effectiveness of Interdiction in Southeast Asia, Second Progress Report* [在东南亚进行遮断轰炸的有效性分析, 第二份进度报告], May 1966, Air Force Historical Research Agency, Maxwell AFB, AL, file

- K168.187-21, 7; 另参看 Senate, Committee on Armed Services, Preparedness Investigating Subcommittee, Air War against North Vietnam [对北越的空中战争], 90th Cong., 1st sess., 25 August 1967, pt. 4, 299.
25. Raphael Littauer and Norman Uphoff, eds., The Air War in Indochina [印度支那的空中战争], (Boston: Beacon Press, 1972), 11, 168—72; 另参看 Earl H. Tilford Jr., Crosswinds: The Air Force's Setup in Vietnam [侧风飞行: 空军在越南的部署], (College Station: Texas A&M University Press, 1993), 109.
26. NSSM 1 (February 1969), Congressional Record [国会记录], 118, pt. 13 (10 May 1972), 16833.
27. A-4 飞行员 John Buchanan 在接受口述历史采访时讲述了这些事件, 详见 Harry Maurer, ed., Strange Ground: Americans in Vietnam, 1945—1975: An Oral History [异域见闻录: 美国人在越南, 1945-1975: 口述历史], (New York: Henry Holt and Company, 1989), 371—80. 尤其请参看第 377—78 页。
28. Sandra Jontz and Kendra Helmer, “Still Going: War Emphasizes Need to Keep Aircraft Carriers” [继续远航: 战争凸显需要保留航空母舰], Stars and Stripes, “Freedom in Iraq” ed., June 2003, 25, <http://www.stripes.com/mideast/iraq.pdf>; 另参看 Eliot A. Cohen, “The Mystique of U.S. Air Power” [美国空中力量的神秘性], Foreign Affairs 73, no. 1 (January—February 1994): 110.
29. William M. Arkin, “Bad News in the Good News” [好消息中的坏消息], Washingtonpost.com, 12 November 2001.
30. Susan B. Glasser, “Afghans Live and Die with U.S. Mistakes” [美国的错误主宰阿富汗人的生与死], Washington Post, 20 February 2002.
31. “Database,” Iraq Body Count [“数据库”, 伊拉克死亡人数统计], <http://www.iraqbodycount.net/database>. 2003 年 3 月 19 日至 5 月 1 日的数据显示, 空投弹药可能导致至少 1,612 名和至多 1,855 名平民死亡, 但是这些数字并未包括巴格达几所医院报告的因不明原因遭受战争伤害而死亡的 1,473 名至 2,000 名伊拉克非作战人员。
32. Edward Doyle and Samuel Lipsman, America Takes Over, 1965—67 [美国接手, 1965-67] (Boston: Boston Publishing Company, 1982), 60.
33. 见注释 7, 第 309 页。
34. 见注释 7, 第 309 页。
35. 见注释 7, 第 101 页。
36. Defense Manpower Data Center—Data, Analysis and Programs Division,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Casualties] by Reason, October 7, 2001 through November 10, 2010” [全球反恐战争: 按原因分类的 [伤亡统计], 2001 年 10 月 7 日至 2010 年 11 月 10 日], http://siadapp.dmdc.osd.mil/personnel/CASUALTY/gwot_reason.pdf. 总共有 2,195 名美国人在伊拉克死于路边炸弹; 在过去三年, 路边炸弹的杀伤率并未下跌。参看 Rick Atkinson, “The Single Most Effective Weapon against Our Deployed Forces” [对付我们作战部队唯一最有效的武器], Washington Post, 30 September 2007.
37. Defense Manpower Data Center, “Global War on Terrorism” [全球反恐战争].
38. Chart, “Afghanistan IED Data for Stratcomm” [为战略司令部编制的路边炸弹数据], November 2010, Joint Improvised Explosive Device Defeat Organization (JIEDDO). “有效的”路边炸弹攻击系指导致伤亡的攻击。
39. Josh White, “U.S. Boosts Its Use of Airstrikes in Iraq” [美国在伊拉克加强空袭], Washington Post, 17 January 2008.
40. Ernesto Londoño and Amit R. Paley, “In Iraq, a Surge in U.S. Airstrikes” [美国在伊拉克空袭剧增], Washington Post, 23 May 2008; 另参看 Tom Vanden Brook, “Drone Attacks Hit High in Iraq” [无人机攻击在伊拉克增多], USA Today, 29 April 2008. 单是在 2008 年 4 月, “捕食者”无人机就实施了 11 次“地狱火”导弹攻击, 比这场战争中以前单月“捕食者”最高攻击次数增加了将近一倍。
41. 见注释 40 中 Londoño and Paley 文。
42. 见注释 39。
43. Jason Motlagh, “U.S. to Limit Air Power in Afghanistan” [美国将在阿富汗约束空中力量的使用], Washington Times, 24 June 2009.
44. 同上。
45. Paul von Zielbauer, “U.S. Investigates Civilian Toll in Airstrike, but Holds Insurgents Responsible” [美国调查空袭中平民死亡, 但认为责任在叛乱分子], New York Times, 13 October 2007. 在 2008 年 5 月 2 日对“萨德尔城一个犯罪分子指挥与控制中心”进行精确弹药空袭之后, 美军代表也是这番说词。电视报道和目击证人的阐述显示, 炸弹落在—

家医院附近，导致平民受伤，但是“美军官员反复指责什叶派战士在人口密集地区作战，并说他们应该对美军导弹袭击造成的平民死亡负责。”参看 Amit R. Paley, “5 U.S., 2 Georgian Troops Die in Iraq, Officials Say” [相关官员说，5 名美军和 2 名格鲁吉亚军人在伊拉克阵亡]，Washington Post, 4 May 2008.

46. Solomon Moore, “U.S. Bombs Iraqi Insurgent Hideouts” [美国轰炸伊拉克叛乱分子藏身之所]，New York Times, 11 January 2008.
47. 同上。
48. 见注释 39。
49. USAF CENT Public Affairs Directorate, “Combined Forces Air Component Commander 2007—2010 Airpower Statistics” [联军空中部队指挥官 2007—2010 年空中力量统计]，31 October 2010, <http://timeswampland.files.wordpress.com/2010/11/afd-101030-001.pdf>.
50. Noah Shachtman, “Bombs Away: Afghan Air War Peaks with 1,000 Strikes in October” [狂轰滥炸：阿富汗空战在 10 月达到 1,000 次空袭的高峰]，Danger Room, 10 November 2010, <http://www.wired.com/dangerroom/2010/11/bombs-away-afghan-air-war-peaks-with-1000-strikes-in-october/>.
51. 同上。
52. Luke N. Condra et al., The Effect of Civilian Casualties in Afghanistan and Iraq [阿富汗和伊拉克平民伤亡的影响]，Working Paper 16152 (Cambridge, MA: National Bureau of Economic Research, July 2010), [1], “Abstract,” <https://afghancoin.harmonieweb.org/Lists/Announcements/Attachments/4/working%20paper.pdf>.
53. 同上，第 3 页。
54. 同上，第 4 页。
55. 同上，第 2—4 页。
56. Bill Roggio and Alexander Mayer, “Charting the Data for US Airstrikes in Pakistan, 2004—2010” [美国在巴基斯坦的空袭统计数据，2004—2010]，Long War Journal, <http://www.longwarjournal.org/pakistan-strikes.php>. 另参看 Greg Miller, “U.S. Seeks More Drone Strikes to Slow Insurgents” [美国试图增加无人机攻击以求遏制叛乱分子]，Washington Post, 20 November 2010.
57. Mark Mazzetti and Eric Schmitt, “C.I.A. Steps Up Drone Attacks on Taliban in Pakistan” [中央情报局在巴基斯坦增加对塔利班的无人机攻击]，New York Times, 27 September 2010.
58. 见注释 56 中 Roggio and Mayer 文；并参看 Bill Roggio and Alexander Mayer, “Senior al Qaeda and Taliban Leaders Killed in US Airstrikes in Pakistan, 2004—2010” [被美国在巴基斯坦的空袭炸死的基地组织和塔利班高层领导人]，Long War Journal, <http://www.longwarjournal.org/pakistan-strikes-hvts.php>.
59. David Kilcullen and Andrew McDonald Exum, “Death from Above, Outrage Down Below” [空袭死亡和民众的愤怒]，New York Times, 16 May 2009.
60. Robert A. Pape and James K. Feldman, Cutting the Fuse: The Explosion of Global Suicide Terrorism and How to Stop It [切断导火索：全球恐怖主义自杀行动骤增及抵挡的对策]，(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 2010), 164—66.
61. Tony Corn, “World War IV as Fourth-Generation Warfare” [第四次世界大战和第四代战争]，Policy Review, web special, January 2006, 8, <http://www.hoover.org/publications/policy-review/article/6526>.



马克·克洛德菲特博士 (Dr. Mark Clodfelter)，美国空军军官学院毕业生，内布拉斯加大学文科硕士，北卡罗来纳大学 Chapel Hill 校区博士，现任国家战争学院军事战略学教授。他曾担任美国空军军官达 23 年，其间在雷达部队服役并担任教职。他两度在空军军官学院教授历史，升任该院军事历史部主任，并成为阿拉巴马州马克斯韦尔空军基地的高级空天研究学院的创始教师之一。他也曾担任北卡罗来纳大学空军预备役军官训练团支队司令官。克洛德菲特博士的著作包括：“空中力量的局限：美国对北越的轰炸”（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06 年）和新近出版的“有益的轰炸：美国空中力量的渐进基础，1917—1945 年”（内布拉斯加大学出版社，2010 年）。